

南宋 六文學僧 紀年錄



橘洲寶曇、北磻居簡、淮海元肇

藏叟善珍、物初大觀、無文道璨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南宋六文學僧紀年錄

黃啓江 著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南宋六文學僧紀年錄

黃啟江著。－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2014.03

面：公分

ISBN 978-957-15-1601-1 (平裝)

1. 僧侶文學 2. 宋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4. 禪宗

224.51

102023060

南宋六文學僧紀年錄

著 作 者：黃 啟 江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楊 雲 龍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七十五巷十一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02)23928185
傳 真：(02)23928105
E-mail：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com.tw

本 書 局 登 記 證 字 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九八八巷十七號
電 話：(02)22268853

定價：新臺幣六五〇元

西 元 二 〇 一 四 年 三 月 初 版

22404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601-1 (平裝)

自序

本書是筆者最近幾年撰述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一議題之副產品。在閱讀橘洲寶曇（1129-1197）、北磻居簡（1164-1246）、藏叟善珍（1194-1277）、淮海元肇（1189-1265）、物初大觀（1201-1268）及無文道璨（1213-1271）之詩文集時，筆者隨手編述了六僧的個別簡譜，發現六僧不但同出大慧法系，師資相承，行履相仿，禪悅之餘，傾心翰墨詩文，樂交文士，形成了南宋叢林中主張不離文字說禪的師友關係網絡。於是決定將六個簡譜萃集成卷，合併改寫。乃廣事披覽，深入探賸，日夕鉤沈，隨想隨錄，竟然涓滴成流，篇幅日夥，字數益增，而積累成卷了。因仿《東坡紀年錄》而名之曰《南宋六文學僧紀年錄》。其所繫年者，雖憑個人主觀認識及喜好，但大致有以下數個著眼點：其一、六僧及相關禪僧之行履、詩文與議論，包括他們對語言文字與禪是否分離之見解。所涉及之禪僧，上自圓悟克勤（1063-1135）、大慧宗杲（1089-1163）、虎丘紹隆（1077-1136），下至兀庵普寧（1197-1276）、環溪惟一（1202-1281）及無學祖元（1226-1286）；其二、六僧與相關禪僧與官宦、士人之互動。後者之經常出現者如張鉞（1153-1235）、史浩（1106-1194）、張孝祥（1132-1169）、史彌遠（1164-1233）、樓鑰（1137-1213）、張良臣（?-1186）、周必大（1126-1204）、陸游（1125-1210）、范成大（1126-1193）、劉震孫（1197-1268）、趙與憲（1179-1260）、程公許（?-1251）、尤煊（1190-1272）、鄭清之（1176-1251）、劉克莊（1187-1269）、林希逸（1193-1170後）等等；其三、六僧與其師友住持各大禪剎之經歷，及其所形成之叢林師友網絡。換句話說，本書雖以南宋六僧之生平行實為編年論述之重點，但涵蓋六僧生平經歷、詩文著述及他們與同時代僧徒、士人掄揚互動之大略，也偶及當時入宋日僧參學之概況。除編年記事之外，兼考訂糾謬僧史之誤，闡明禪僧與士人之間的詩文交流與酬唱，并叢林與士林間之文化交錯之關係，希望一面凸顯禪僧對於

文字之用心及其文學造詣，一面彌補史書忽略文士法喜之游與宗教生活之缺憾。

六僧之生平行事、詩文寫作及其與文士之互動關係，多見於其詩文集中。語錄雖有資料可稽，但相當有限；燈史、僧傳及方志可資取材者更是鳳毛麟角。詩文集方面，自寶曇以下，除了善珍之《藏叟摘藁》僅兩卷外，餘皆十卷或十卷以上。語錄則反而卷數甚少，寶曇與善珍甚至無語錄流傳；而居簡、元肇、大觀與道璨之語錄都僅一卷。這或許與六僧之弟子未能詳錄其法語有關，但亦顯示六僧豈僅僅是「暫過朝市歸山林」而已？¹他們杖履山林朝市之間，以詩文會友，與士人傾蓋相交，對文學世情之重視，似不在上堂說法之下。這都足以證明他們對禪之不離文字，或文字不離禪之觀點有相當的執著，反映了對北宋龍井辨才「文字不離禪」一語的認同；辨才不是曾說「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不離禪」嗎？²筆者稱他們為「文學僧」是有其深意的。至於燈史、僧傳及方志之缺載六僧，在本書的敘論部分有詳細的討論；該部分也同時討論六僧之間所共有的宗門法兄弟，說明他們與這些法兄弟之間所建立的「宗盟」或師友網絡之關係，在本書紀年部分的本文都可以看出。

南宋詩僧與文學僧甚多，都有詩卷或文集流通於師友之間，除了六僧詩文集之外，光是道璨所品題者，就有十餘種，如《韶雪屋詩集》、《雪仲剛詩集》、《橘林詩集》、《瑩玉澗詩集》、《仙東溪詩集》、《康南翁詩集》、《敬自翁廬山行卷》、《靈草堂天目行卷》、《悟上人金陵詩卷》、《復休庵詩集》、《禮

- 1 明教契嵩有〈山中自怡謝所知〉一詩，起句云：「萬事隨宜勿強攀，暫過朝市即歸山」，為筆者此句之所本。契嵩詩見《鐔津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6）卷20，頁14a。
- 2 見蘇軾，〈次韻參寥寄少游〉，《蘇軾詩集合注》卷48，頁2379。原詩云：「巖棲木石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畫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夕烟。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不離禪。」按：此詩查慎行於其《蘇詩補註》，辨為龍井辨才所作。其語云：「右七言律一首，乃辨才法師詩。本集先生自書此詩而題其後云：『辨才作詩時年八十二矣。平生初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若參寥與吾輩詩，乃如巧人織錦耳。又按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載辨才此詩於〈龍井〉條下，附見少游參寥和詩，《淮海集》詩題云：『辨才師以詩見寄，繼聞示寂，追次其韻』云云，即此首韻，則又其一証也；今駁正。」見《蘇詩補註》卷50，頁8b-9a，亦見上引《蘇軾詩集合注》。查說言之成理，此處採其說。

菊泉詩集》、《越山詩卷》和《月池詩卷》等等。³其他如大觀所披覽的《定勝叟文集》、《康南翁詩集》、《侃古樵詩卷》、《樵屋吟藁》、《不群禪餘》、《安危峰自成集》、《愚谷山居詩》、《頤蒙詩卷》、《竹間遣困藁》、《草菴蘿月詩》和《講餘吟藁》等等，⁴都是可供我們探蹟南宋禪文化的寶貴素材，可惜都已不傳，實令人扼腕。六僧之詩文，筆者雖曾著書析論，但所論不過是其九牛之一毛。若從禪史的不同角度去審視其豐富之內容，相信必能觀察到其人生活之不同面向，從而產生新的認識。筆者重閱六僧的著作，以編年記事之方式考述六僧之行實，得以從不同之角度觀察問題，就是希望獲致這種結果，也希望能透過新的理解與發現，藉此機會補充並釐正舊作的缺失。當然，六僧所涉及之人與事多而繁複，其詩文也時有因背景不明，而難以繫年之缺憾。至於誤解詩文原意而導致繫年失準，恐亦在所難免。或有一得之愚，也期有「博達之士，操董狐筆，著僧寶史，取而補之」，則「土苴鱗漏」，亦「不為無益」也。此大慧弟子雲臥曉瑩之語，姑藉之以表達拋磚引玉之悃。

本書得以完成，頗獲親友多年來之各種協助，已在先前相關著作表示致謝之意，不另多贅。初稿將完之時，老友忘年交楊龍章教授不幸仙逝。楊教授在世時，常鼓勵筆者多寫詩文，傾心著書。凡筆者之寂寥短章或春容大篇，他都樂於先睹為快。筆者也答應定稿之後，必呈請指謬。不幸書未成而人已去，豈其深有所期而不欲見余之苟作乎？思念及此，乃連番增刪，詳加考訂，又歷半載而成；期庶幾無大紕謬，以慰九原之知。書稿既完，內人又提醒筆者母難日將至。先母去世已近半世紀，雖泉壤相隔，幽明兩分，但筆者在海外三十餘年，依舊陟岵陟屺，思念不斷。謹以一瓣心香，獻上此書，以奠祭她在天之靈。

莆陽 黃啟江 謹識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於紐約上州日內瓦城因知樓自宅

3 這些詩卷之名，都可見於道璨的《無文印》中。詳筆者《無文印的迷思與解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4 同樣地，這些詩卷之名，都可見於大觀的《物初賸語》，可參考筆者《一味禪與江湖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南宋六文學僧紀年錄

目次

自序·····	I
敘論·····	1
南宋六僧紀年錄本文·····	71
壹、編例·····	71
貳、本文·····	73
卷一、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孝宗隆興元年（1163）·····	73
卷二、孝宗隆興二年（1164）至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	133
卷三、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至慶元六年庚申（1200）·····	192
卷四、嘉泰元年辛酉（1201）至嘉定五年壬申（1212）·····	221
卷五、嘉定六年癸酉（1213）至景炎二年丁丑（1277）·····	245
參考文獻·····	423

敘論

一

本書是南宋六位禪僧生涯行事的編年記錄，這六位禪僧是橘州寶曇（1129-1197）、北磻居簡（1164-1246）、淮海元肇（1189-1265）、藏叟善珍（1194-1277）、物初大觀（1201-1268）、無文道璨（1213-1271），他們都有詩文集傳世，是筆者在最近幾本著作裏所稱的「文學僧」。因為他們留下不少詩文，而詩文中顯示他們與官宦文士的交往記錄，所以本紀年錄也包含相關歷史人物的行事紀年。前後所歷年代幾乎涵蓋整個南宋，但主要活動都在孝宗淳熙朝至理宗景定朝。

為何要為這六位禪僧編寫這個紀年錄？原因如下：其一，由於這六位禪僧都是大慧宗杲之徒子徒孫，分別為大慧下的第一、二、三代。與大慧一樣，他們結交了不少文士、官僚，在叢林也大都主持重要禪寺，包括五山十剎法席；都有領袖羣倫、舉足輕重之身分與地位。他們所有的活動及所表現的禪文化即是南宋禪文化的一個重要面向。其二，由於他們都有詩文傳世，而他們的詩文都留下了語錄之外的生活記錄，¹表現身為禪僧卻不離文字而好尚詩文的認知與精神，為同時代的官宦與士人所敬重。所以他們所交之方外友多半是政壇或儒林之重要人物，呈現出若干相關的禪文化交涉羣。其三，六位禪僧雖然聲望頗高，在南宋禪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但宋以來之僧史、僧傳、燈錄、禪僧筆記、方志、佛寺志等對他們的紀錄都嫌太缺，而所錄之行事經歷又多不繫年月，難以顯示他們在叢林活動的實際情況與意義。若是僅靠這些資料去理解南宋

1 除了寶曇、善珍外，其餘四位都有語錄傳世。

叢林的全貌，是無濟於事的，需要參考六僧之著作。其四，此六位禪僧都善於詩文之創作及書畫之蒐藏與鑑賞，而其周圍之法眷、法友、同參、法嗣、文人、居士亦多以此相勸相酬，結合了叢林之禪風與士風，使禪院不再是寂寥離世，超塵脫俗的神秘地域，而是活潑有生氣的社會組織。透過這六位禪僧，我們可看見森嚴像設、三門大殿之外的禪文化世界。

筆者既已有專書討論此六僧，覺得有必要再根據他們的詩文，將他們的生平行事，詩文翰墨，與交游事實，編年繫月，聯綴成卷，輔以重要官宦文士與他們互動事跡之記錄，來彰顯南宋禪文化之歷史縱深。所以，本書實不僅為年譜之合編，而是南宋文學僧及其所形塑的禪文化之縮影。

必須說明的是，六位禪僧之傳略散見於僧史、僧傳、燈錄、禪僧筆記、方志及佛寺志中，雖然所錄之行事都很有限，且多不繫年月，但也未必皆無可採之處，已為今人研究六僧不可或缺之資料。不過因為它們的記言與記事，多半是即興而欠組織的，所以是不足以滿足禪史之研究。我們既有六僧之詩文集，就應該以它們為原手資料，來發掘歷史事實。問題是，既然有六僧之詩文集可參閱，為何宋元以至於後來的僧史、僧傳等書之作者並未利用或未能善用這些詩文集？這大概是因為六僧之詩文集及語錄之印本有限，在宋以後流傳不廣又不易得之故。以元僧熙仲（生卒年不詳）所編的僧史《歷朝釋氏資鑑》為例，除了寶曇之外，其他五僧幾不見蹤跡。寶曇的傳略雖然可見，但相當簡短，或有參考寶曇詩文集《橘洲文集》之可能，但也不能確定。他是這樣描述寶曇的：

橘洲曇禪師，蜀人，名擅天下，一時士夫咸尊師焉。丞相史公一門皆崇事之，凡有質疑必咨之。延住杖錫，後造竹院居之。觀〈史魏公放魚〉云：「試問恩波幾許深，一湖渾是使君心。巨鱗細口重相見，雷電風雲去自今。」非但詩文，宗說俱通，世莫能及。撰《大光明藏》，盛行於世。一日沐浴更衣，請史魏公敘平日行記，笑談而化。茶毗，舍利無數。²

2 《歷朝釋氏資鑑》（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新編》第132冊，1975）卷10，頁233b-234a。

這段傳文中的「丞相史公」就是史浩，也很明顯地是「史魏公」。所以「丞相史公一門皆崇事之」云云，告訴讀者寶曇與史浩家庭之密切關係。但「延住杖錫」及「後造竹院居之」太籠統，確切時間無從查考。而〈史魏公放魚〉一詩，是寶曇所作，是他見史浩將魚放生所作，不能讀為「史魏公〈放魚〉」，解為史浩的〈放魚〉詩。寶曇此詩見於《橘洲文集》，而不見於其他宋人別集、總集或其他典籍，所以按理說，熙仲是曾參考寶曇《橘洲文集》的。但他為何不提寶曇此書，而僅說他撰《大光明藏》？文末的「請史魏公敘平日行記」一語，可以看出熙仲深知寶曇與史浩之深厚交情，但他為何對史浩所撰行記之內容全無著墨？

熙仲即使未能見到橘州寶曇的《橘洲文集》，應該也瀏覽過宋代的僧史及叢林筆記，知宋代僧史中《釋門正統》是最先提及寶曇之名者。只是它並未敘其傳略，僅指出蜀僧曇橘州曾跋柳宗元的〈東海若〉一文。³雖然如此，對熙仲來說，也是一則史料，但是他並未使用。南宋僧道融（生卒年不詳）的隨筆札記《叢林盛事》，描述寶曇生平事跡最詳，熙仲不應不知。道融是如此描述寶曇的：

曇橘洲者，川人，乃別峰印和尚之法弟。學問該博，擅名天下。本朝自覺範後，獨推此人而已。住蜀之無為山，遭橫逆，來下江。丞相史公尊其學業，舉以住明之仗錫。初入院時，二相親送。其後史公復造竹院以延之，凡有質疑事必問。故別峰自金山來雪竇，諸山一疏，乃曇撰之。其詞曰：「住雪竇好，住翠峰好，老子當斷自胸中。為法來耶，為牀座耶，此行殆出人意表。無愧乎東山直下四世，望之如西湖雪後諸峰。但得心同、道同、出處同。休問佛界、魔界、眾生界。新乳峰禪師，聲飛吳越，價重岷峨。住海門國，逾一十有二年；肆瀾翻口，說八萬四千偈。如山屹屹，有陣堂堂。與其據滄波而擾蛟龍，孰若依蕙帳而友猿鶴？載念伊蘭之世，冀一現於優曇；計非師子之家，當盡摟其種類。歸來及早，慰我同門。」此話江湖競傳之（時自得暉交代）。然曇賦性坦率，不事拘檢。在竹院日，復以酒事遭太守林侍郎追至。出對與之曰：「酒曇過界，住無為而無所不為。」

3 《釋門正統》卷4，頁819b。

蓋曇曾住無為故也。而曇卒不能對，復為林流過丹丘。二年回寶奎。一日，沐浴更衣，請史魏公敘平日行紀。談笑中而化。閩城士俗皆送之。茶毗，獲舍利無數。⁴

這篇傳略跟一般僧傳不同之處是它並未錄載寶曇的機緣對話和上堂語，而引述他為請別峰寶印入雪竇寺所作的諸山疏。此疏可見於《橘洲文集》卷九，題曰〈別峰和尚住雪竇疏〉。二者雖然用字略有小異，但是寶曇之作無疑。⁵最重要的是，傳文中所說此疏競傳於江湖，顯示當時叢林對此類疏文甚為重視。此外，其中述及丞相史公尊其學業並為敘平日行紀二事，與其文集比對，可證明孝宗朝丞相史浩（1106-1194）之尊禮寶曇確為不爭之事實。至於因「酒事」遭太守林侍郎追至，而出對不能答遂被「流放」至丹丘之事，則是僅有之記錄，他處皆未見，不無疑義。何況丹丘（台州）有海陸之饒，⁶並非流放犯人之地。寶曇又為史浩所尊禮，郡守豈敢因「酒事」而流放他？雖然如此，寶曇之入丹丘，應為事實，而且可能在紹熙二年（1191），因為他曾寫〈台州白塔寺三目觀音記〉敘台州通判李直柔於七十二年後，繼其祖父李景淵（生卒年不詳）來倅台州，而白塔寺僧告以舊寺記未刊，遂命寶曇再記之事。⁷至於傳說中將他「流放」之「林侍郎」應該是淳熙十六年（1190）以中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的林栗（1142

4 《叢林盛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續藏經》第148冊，1975）卷下，頁90ab。

5 按：日本元祿11年刻本《橘洲文集》之文，與此文有小異。譬如，「新乳峰禪師」，文集作「某人」，為疏文之慣例，指的是受薦請之人，也就是新任的雪竇寺住持。道融可能因行文之需要而改。其他如「如山屹屹」，原文作「如山岌岌」，兩者皆可通。「有陣堂堂」文集誤為「有陳堂堂」。「休問佛界」，文集作「不論佛界」，前者稍佳。「據滄波」，文集作「踞滄波」，後者較通。「載念」，文集作「眾念」，前者較成對。

6 《方輿勝覽》卷8，頁136。

7 寶曇，〈台州白塔寺三目觀音記〉，《橘洲文集》卷5，頁6a-8a。按：寶曇記中之李直柔祖父為李景淵，先任台州通判，後於宣和三年陞郡守。記中之郡守趙公，為趙資道。見《嘉定赤城志》卷9，頁14b-15a。

年進士)；因為他在守明州前曾任兵部侍郎，故稱「林侍郎」。⁸寶曇有〈上林侍郎〉一書，書中稱林侍郎為「知府侍郎」，必然是他。寶曇書中還表示「嘗聞著書發揮三聖人之道，其詞要妙，其旨精深」，引為同道，欲以將完成之《大光明藏》求質於他。此可證明他與所稱的「一世偉人」林栗之間，有某種程度之契合，不是林栗會懲戒而流放之對象。⁹且林栗出對聯考寶曇而寶曇對不出之說，如稗販之談，豈能視為真？不管如何，《叢林盛事》所記，有真有假，不可全信。但熙仲若能善加利用，亦足以將寶曇和史浩之關係描寫得更深刻。

宋僧之隨筆札記除了《叢林盛事》含寶曇之記錄外，圓悟的《枯崖漫錄》也有記載。但是熙仲顯然也未參考此書。其實《枯崖漫錄》裏的寶曇傳略，是《叢林盛事》以外唯一敘述寶曇的宋僧筆記，也是禪宗典籍裏有關寶曇的稀有記錄之一。它對寶曇的描寫如下：

字少雲，嘉定府人。出峽，住明之仗錫。暇日著論發明佛祖機緣，名曰《大光明藏》。筆勢宏濶，惜未成全書而寂。論贊丹霞云：「剗殿前草，騎聖僧頂，天寒燒木佛，三事併案，夫豈他人所能？如衡山之雲，軒豁呈露，遽見突兀，不自〔以〕為能也。然時有觀顧怖悸，而喪其所守者，院主是也。等閑放過南陽侍者，而直擒取南陽國師，所謂挽弓須挽強，用鎗須用長，是此手也。重哀末世疲癯之疾，增損古人必効之方，成大法藥〔學〕者，宜用元和津嚙下；和平之福，可立而俟也。」余見佛智老人，偶閱此，且曰：「學者亦宜於此用元和津嚙下。」洲嘗自撰龜志，略云：「初聽楞

8 林栗自淳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赴慶元知府之任，次年八月二十五日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他任兵部侍郎時，朱熹以江西提刑被召為兵部郎官，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朱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遂論朱熹不學無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葉適以太常博士上封事辨之。參看張如安，〈南宋禪僧寶曇生平及其作品〉，《鄭州文史》第十輯（2010），頁230-250。

9 寶曇，〈上林侍郎〉，見四卷本《橘洲文集》（臺北：漢聲出版社，《禪門逸書初編》第五冊，1981）〈附錄〉，頁79-81。前引張如安文認為此位林侍郎是慶元元年知慶元的林大中，但揆諸寶曇文之內容及黃幹的〈代祭林黃中侍郎文〉之強調通經，似為林栗較妥。林大中不以經術名。

嚴、圓覺、起信，復捨去，依成都昭覺微庵、白水_山庵。挈包南來，從先大慧於育王徑山。後見東林萬庵、蔣山應庵。辛苦艱難，始畢平生之願。」則知其涉歷尤艱辛，未聞容易而得也。¹⁰

這段傳文，也是關於寶曇不可多得的記載。雖然未言及他與史浩之關係與詩文之長處，但強調他在撰寫禪史方面的用心、論贊丹霞天然禪師所表現對唐、宋文人詩文之熟悉，¹¹都是相當有價值之史料。所引之「龕志」，出《橘洲文集》，呈現他艱苦力學的過程。作者圓悟顯然對寶曇有相當的認識，傳文中提到他曾跟隨的大慧、稱讚他的佛智端裕、及他所從學的卮菴道顏及應庵曇華，都是高宗、孝宗兩朝叢林舉足輕重的人物，顯示寶曇在大慧與虎丘二系間，毫無門戶之見的參學傾向。凡此皆足資熙仲參考以補僧史之缺。可惜不但熙仲未加以利用，後來之明清僧史作者似於此記載似都無所知，令人不無遺憾。

《歷朝釋氏資鑑》是部編年體的佛教史書，應是以記事為主，記言為輔。所以它所記錄的禪僧活動，較注意行事之繫年。雖然因為文字簡約，繫年常有差錯，還是研究南宋僧史需要參考的史料。可惜它對本書所關切的六僧，除了寶曇之外，都缺乏記載。

以記事為主的寶曇傳略，還可見於宋理宗寶慶朝所編寫的《寶慶四明志》，它的寶曇傳略，在記事方面，遠比《歷朝釋氏資鑑》為豐富：

10 《枯崖漫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卮續藏經》第148冊，1975）卷下，頁152b。按：圓悟之引文出自《大光明藏》卷下，頁883b，〈鄧州丹霞天然禪師〉傳之寶曇論贊。由於有漏字，筆者以括弧〔〕加入。

11 譬如，「衡山之雲」一詞，出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中之「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一句；「軒豁呈露」及「觀顧悻悻」二詞，出韓愈〈南海神廟碑〉中之「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及「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悻悻」兩句；「挽弓須挽強，用鎗須用長」兩句出自杜甫的〈前出塞〉一詩；「元和津」一詞及其句「元和津燕下」，亦得自杜甫〈幽人〉一詩的「燕漱元和津，所思煙霞微」之句。

僧寶曇，字少雲，姓許氏，蜀嘉定龍游人。幼從鄉先生授五經，習章句業，已而棄家捨須髮，從一時經論老師游。挈包來南，從大慧於育王、徑山，又從東林已庵、蔣山應庵，遂出世，住四明仗錫山。歸蜀葬親，又往無為寺，復來明，太師史越忠定王深敬之，築橘洲使居焉。工文辭，有《橘洲集》十卷行叢林。始為蜀士時，師慕東坡，後游東南，敬山谷，故文章簡古高妙，有前輩風。又倣太史法著《大光明藏》，以西方七佛為紀，達磨以降諸祖師，則傳之未絕筆，故不傳。然每自謂於第一義諦心有得，人謂我以文詞鳴，是未知我者。慶元三年四月二十日辭世。臨行頌曰：「平生灑灑落落，末後哆哆和和。殷勤覓一把火，莫教辜負澄波。」¹²

這段記載之「復來明」，其實是「復來四明」，而太史越忠定王，則是孝宗朝宰相四明史浩。因為寶曇先已住四明仗錫山，故歸蜀葬親後「復來四明」。他在四明期間與四明史浩家庭之來往，是他生涯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時段，所以「太師史越忠定王深敬之，築橘洲使居焉」兩句，頗富深意，須進一步查其究竟。又「師慕東坡」與「敬山谷」及「文章簡古高妙」等語，可證於其詩文。而《大光明藏》祖師以下，「傳之未絕筆，故不傳」，實是因為「書未成而寂」之故，正與《枯崖漫錄》之說相符。

以上宋元燈史、燈錄及方志作者所提供的寶曇傳略，雖然可以供研究寶曇之參考，但是還是不足的。不幸的是，後來的僧史、僧傳等作者並未注意蒐集有關寶曇之資料，造成了宋元以後幾無寶曇記載可見之情狀，我們可以推想他的《橘洲文集》並未受到應有的注意。

其他五位禪師在宋元僧史、燈錄、僧傳、禪僧筆記及方志之記錄也有詳略之不同，有記載多而詳者，也有少而略者，但大體上還是不足的。這種缺憾原因甚多，雖然其中之一的可能是他們在世傳法的時間較晚，其詩文集和語錄鮮為宋元作者所見之故。但以《歷朝釋氏資鑑》處理寶曇事跡之簡略來看，其詩文集之受

12 《寶慶四明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1983-1986）卷9，頁48b-49a。宋寶慶年間鈔本作「葬葬親」。

注意與否也未必是原因。更令人扼腕的是，不但宋元之記載只有一鱗半爪，明清之記載也相當有限。

以北礪居簡為例，北礪居簡在宋代的僧史與燈錄中雖然可見其名，但只是曇花一現。譬如，志磐的《佛祖統紀》應該是最早記錄居簡行事的僧史，但只錄了他為淨悟法師作的塔銘而未及其他。¹³此塔銘不見於居簡文集中，所以也無法證明志磐是否知道居簡北礪文集之存在。在元僧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中，也僅見居簡之名及他弔永道法師塔一文。此文在其居簡文集中題為〈道法師逸事〉，確為弔永道塔文。¹⁴燈錄方面，宋僧普濟的《五燈會元》裏，只提到居簡的〈五種不壞贊〉，是為明教契嵩所寫的。¹⁵

熙仲的《歷朝釋氏資鑑》裏也述及居簡之名，但僅是引述水心葉適(1150-1223)和盱江張自明(寧宗嘉定朝人)對他的贊美，其文如下：

侍郎水心葉公，適北澗〔礪〕簡禪師住台之光孝日。公酬師云：「簡師詩句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好兒女，塗紅抹綠未禁春。」師遷淨慈日，賢士夫趨朝，無一不過門就謁。盱江張誠子題師集曰：「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為一人，莫能當也。」雖詩文名立，學佛尤還焉。¹⁶

這段記載所引之葉適酬居簡詩及張自明之題詞，都可見於今《四庫全書》本《北礪集》。但這並不能證明熙仲是參考《北礪集》而寫下此段文字的，因為他並未提供居簡之傳略，既未記言，且記事亦少；只說他曾住台州光孝寺及杭州淨慈寺。此外，也無繫年，不足以補僧史之缺。

宋元的方志作者，對居簡也不太留意，並未為他立傳。譬如，宋人楊潛(生卒年不詳)在紹熙朝編的《雲間志》，不敘居簡生平，而僅錄他的〈白蓮花詩〉，

13 《佛祖統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大正藏》第49冊，1983)卷18，頁238b。

14 見《北礪集》卷6，頁33a-34a。

15 《五燈會元》(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卷15，頁1005。

16 《歷朝釋氏資鑑》卷11，頁226b。按，「還」疑為「還」之誤植。

是他與僧俗之友數人為華亭三女岡所作。¹⁷南宋獨湖居士孫應時（1154-1206）在寶祐朝重修的《琴川志》僅說居簡曾於嘉熙四年（1240）為平江法寧教寺作記，並收錄他在嘉定九年（1216）作的〈大慈寺鐘樓記〉。¹⁸元人單慶的《至元嘉禾志》也不敘他的生平，而僅收錄了他的〈明行院記〉、〈明行院結界記〉、〈本覺禪院三過堂記〉等三篇記文及〈白蓮花詩〉，詩題改為〈題三女岡白蓮花詩〉。¹⁹這幾篇詩文，大概頗傳於當時，雖都可見於現存居簡詩文集，但楊潛、孫應時及單慶也未必是因閱過居簡詩文集而引述它們的，因為他們若見得北礪詩集和文集，大可為居簡立傳，以見居簡非一般禪僧可比。

居簡之文集一直流傳至清修《四庫全書》之時，他的語錄也未曾失傳。照理說，宋元及後世僧史、僧傳作者可善加利用，但事實並非如此。其餘四位禪僧之著作或流傳不廣，或根本失傳，就更難引起宋元作者之注意了。

以淮海元肇〔或作原肇〕為例，宋代之僧史、燈錄等都無記載。元僧熙仲的《歷朝釋氏資鑑》有一段簡述如下：

水心先生退居田里時，淮海肇禪師游東嘉，題江心。公聞有奇逸之句，遣使延之。師就〔獻〕上三律，錄其一云：「文字滔滔江漢東，早從伊洛定宗風。中興之後數人物，北斗以南惟我公。聞道治平猶草奏，向來持論不和戎。匪伊再入脩門去，只有孤忠與昔同。」公饒師游雁蕩云：「海闊淮深萬里通，吟情浩蕩逐春風。更尋斗絕龍湫住，裁剪煙雲字字工。」師後住江心，由育王、淨慈、靈隱、雙徑，名振一時。²⁰

17 宋·楊潛，《紹熙雲間志》卷中，頁10b。

18 宋·孫應時，《寶祐重修琴川志》（清道光三年瞿氏恬裕齋影元抄本）卷10，頁11a；卷13，頁14b-15b。

19 前兩文見《至元嘉禾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6）卷20，頁1ab；也見於元·徐碩的《嘉禾金石志》卷20，頁1a-2a。後一文見《至元嘉禾志》卷22，頁12a-13a。〈題三女岡白蓮花詩〉見同書卷30，頁12a。

20 同前註。按：「就上三律」，當為「獻上三律」之誤刻。

此段文字引述淮海元肇與葉適間之詩文酬唱，證明淮海元肇為葉適所見賞。所述的元肇的履歷雖簡，但也列明他所住持的主要禪剎如江心、育王、淨慈、靈隱及徑山等等，也說明他在叢林的地位，都可以從元肇留下來的詩文及大觀所寫的行狀得到印證。可惜住江心等寺院的經歷都未繫年，而他在通州、湖州、天台、平江等地的經歷也缺載，作為僧史，是頗不足的。

宋元的方志，對元肇的記載也是相當缺乏的。元人的《元祐四明志》只在介紹雪竇寺時引述了元肇的一首詩說：「淮甸僧元肇題〔千丈巖〕云：『上盡崎嶇腳力微，毳袍零碎染烟霏。妙高峯頂見日出，千丈巖頭看雪飛。寒木著霜山衣錦，清泉得月鏡交輝。翩然又作東南去，肯落台溫第二機。』」²¹這首詩可見於元肇詩集，但只是元肇許多詩中的一首，詩的內容涉及台州與溫州，是元肇去過的兩個地方，與他關係至深，但方志並未提供任何線索。

宋元僧史，燈錄及地方志對其他三僧之記載，亦如同對寶曇、居簡和元肇之記載一樣缺乏。以元肇之至友藏叟善珍來說，這位被元詩評家方回認為是元肇以後南宋詩僧之最著者，《歷朝釋氏資鑑》竟然僅在述及愚谷元智禪師時，節錄善珍之文，而未交待作者與其文所作之緣由，所以也看不出其文是出自善珍之手。善珍之名出現於文末，也讓讀者有突兀之感：

愚谷智禪師、節齋趙公，結為方外友。師住翠峰時，壽公偈曰：「楞伽塔上石湖波，寫作千秋一曲歌。七十二峰齊點首，月明長滿宋山河。」泉守趙大監集諸禪主首曰：「法石壞於暗卦久矣。欲革斯弊，非得江湖衲子不可。」師時居靈隱為第一座。守焚香拈得，喜甚。亟馳書招致，眾果悅服。未二年，百廢俱舉。連帥端明史公以西禪招師，將行，出大監書綬梓，令其〔某〕書其後。善珍謂：「此有關吾教數十年，後當有好事者收入野錄。亦一段佳話也。〔藏叟跋〕」²²

21 《元祐四明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6）卷17，頁33a。

22 《歷朝釋氏資鑑》卷11，頁226b。